

界所重视,并成为当今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流。这里必须明确:与通才教育相对的是专才教育,通才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没有专业性的通才教育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

通才教育强调专业人才的知识面,因而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整合,也有助于文化的整合。但是,无论是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注重的主要是知识结构和培养“才”的一面。完整的教育还应包括培养“人”的一面,从全面发展意义上说,至少应进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并不是仅靠知识教育就能实现的,所以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这不仅是大学生个人的发展所必需的,而且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更好地增进文化的整合。

其次,课程建设是实现文化整合的基础。高等教育的整合具体地体现在课程上,因为高等教育目标主要依靠课程来实现。当然,培养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并不是说课程所含科目越多越好,体现在课程上的教育整合也并不是靠简单地增加科目来实现的,重要的是课程结构、科目分配、教材选择乃至教学制度、教学方式和方法的运用。通过教学制度、教学方式与方法确保学生能在有限的期间内自由灵活地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使学生具备多方面知识和受到多方面教育并非要削弱专业教育,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专业、专业课程的组合及其实施。国外传统的措施是将多方面知识的教育(普通教育)放在大学的前两年,后两年着重进行专业教育。这种制度近年来有所调整,日本有把普通教育贯穿于整个大学阶段教育的趋势,美国高等工程教育中的学群集课程、英国大学的学科链、筑波大学的学群、巴黎大学的科际整合等,都是对传统大学普通教育措施的改进。然而,如何实现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之培养目标,尚须进行全面探讨。

再次,高等教育机构的综合化是实现文化整合的重要条件。高等教育机构的综合化具体表现为学科、专业的多样化,这样利于学科间的交叉、渗透、综合,并为教育的整合提供条件。不同学科、专业汇集,有利于各学科、专

业信息、资料的交流;有利于形成综合性的学术文化氛围,便于弥补正式课程在实现教育整合,达到文化整合上的不足。高等教育的综合化已成为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如美国的理工院校、法国的大学、德国的工科大学、英国多技术院校和日本的高等专门学校等,都表现出了综合的特点。

除上述外,还有不少有效措施值得重视,如在校内开展不同学科的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对同一社会或自然现象展开多学科的探讨,开展各种跨学科的学术讲座等,同样可以实现不同学科、专业师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进而避免学科、专业间隔离现象的出现。

总之,文化整合作为高等教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教育过程之中,是通过教育的整合来实现的。高等教育要使各类专业人才不受学科、专业局限而具备相互间对话、交流和合作的基础,使文化整合不止体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身上,而能通过这些专业人才见效于整个社会之中。随着社会特别是科技和文化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 文化传统与 高校教学改革

王伟廉 (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生导师)

在高校教学改革中考察文化传统的影响,已日益受到重视。这方面影响因素的作用有时明朗,有时朦胧,且常与其它因素混杂在一起,再加上对文化本身内涵的理解尚见仁见智,使进行这方面研究显得较为复杂和困难。这里仅就文化传统中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心理倾向性三个因素中某些方面对高校教学改革的影响谈些个人见解。

关于哲学思想,我想在此着重谈一下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对西方高校教学改革的某些影响,并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谈谈中国高校当前提倡人文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人文主义哲学在西方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种哲学以人

为核心，强调人的精神的自由与和谐。这对早期大学影响极大。中世纪大学几乎都是人文主义指向的，其教学内容的反映便是把人文教育或“自由教育”既作为所有学问的基础，也作为整个教育的目的。自那时起，虽几经社会变迁，“自由教育”之精髓却始终如一，即以发展完整人格、培养广博学识与独立思考精神为主旨。而这种发展唯有通过关于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全部学问的理解与把握才能实现。

19世纪，科学主义在西方兴起，并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得到充分发育。此后便与人文主义在高校教学中分庭抗礼：前者面向个人发展，重学识与修养；后者面向社会发展，重科技与职业。二者虽相互消长，然而人文教育却始终稳居“各科基础”之宝座，似不能不归因于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巨大历史惯性及其内在的合理成份。

中国高校当今也在力倡人文教育，更有学者称，我国向有人文教育传统。然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占主流的乃是道德哲学，反映在学校中，虽有人文教育之谓，其实质却更偏重于人际关系，讲求伦理纲常。至于科学主义，因中国近代以来多灾多难、内乱外侮，虽经有识之士力荐，“赛先生”却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发育。因此，中国高校教学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实际上均是弱项。由此可见，因文化传统不同，也造成了人文教育上的差异：中国的人文教育不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而西方人文教育，这两类学科内容必不可少。这里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当前在强调人文教育的时候，也不应忽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内容所具有的人文教育价值；在注重倡导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育人价值的时候，也勿忘记中国科学教育的先天不足。

关于思维方式，不少学者都作过研究，得出很多耐人寻味的见解。比如有学者认为，从东西方文化传统讲，西方人思维讲究“如何可能”，中国人则讲究“应该如何”。故而前者重决策与行动，后者重价值判断与规范。耗散结构理论的奠基人普利高津也认为，定量分析是西方传统，而中国传统是对自发自组织现象的描述。这些都说明东西方之间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其实，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的人类群

体在其长期生活中都会形成某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例如在科研上，日本人善于在别人成果基础上改造和创新；欧洲人善于搞理论而不善搞应用；美国人在应用与发明上使其它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这些多少说明各国本土多年形成的传统的影响。

思维方式的差异与高校教学改革关系颇为密切。有位中科院院士曾对中美两国大学数学专业的教材作过比较，发现在编写教材过程中明显反映出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美国教材多使用归纳法，中国教材多使用演绎法。笔者由此联想到，中国学生善解难题并在应付考试上身手不凡，而美国学生善于发现，却在解题中显得笨拙，是不是与教学中思维方式的训练有关？不同的思维方式各有所长，在此问题上似应取“互补互学”态度。故而那位院士建议采取“拿来主义”，认为这比自己在同一思维方式影响下苦苦摸索，要划算得多。

中国不同地域的亚文化传统也会形成某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从而影响高校教学的许多重要方面。今年春节晚会上有个节目，反映北京、上海、西安三地居民在处理遗失钱包上的三种不同态度，实际上多少反映了三种亚文化的不同思维方式，看后回味无穷。在我国学术界，常有南派、北派、京派、海派之分，这中间也包含了不同亚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不同的高校，其“校园文化”的差别，也有不少方面与各自多年形成的思维方式有关。由此才有了“防止近亲繁殖”、“促进校际学术交流”的举措，目的不外乎使各自在思维方式上取长补短、相互交融，以求最大限度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在当前高校教学改革中，融东西方之间、各国之间、各校之间不同思维方式为一炉，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恐怕是我们要做的一件大事。

心理倾向性问题。实际上，也可把它看成某种思维方式。不同的是，其作用较隐蔽，且比较不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

心理倾向性作为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因素，在高校教学及其改革中有各种表现，这里仅摘其中两点作些探讨。

国学大师钱穆曾讲，世界上有三种主要文化，即中国文化、欧洲文化和印度文化。中国

文化讲“孝”，是晚辈对长辈而言；欧洲文化讲“爱”，是就同辈而言；印度文化讲“慈”，是长辈对晚辈而言。若依钱老所说，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下对上”的文化。由此所形成的心理倾向性可以有三种性质：尊老敬老、忠君报国和尊师重道，是其好的一面；崇尚权威、崇尚古人贤人可算作“中性”的一面；而“唯上”、“唯书”则是负面了。这三面对高校教学改革都有影响。这里只谈负面影响。在中国，唯书唯上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对学校教育影响颇大。治学与教学中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遗风历经千载，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涛声依旧”；中国大学生以至教师，很少批判精神，改革中也很难见到以批判精神为主要目标。这多少与上述负面影响有关。不然为何要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说到底，在高校教学改革中反对唯书唯上，提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本质上也是向传统的一种挑战。

心理倾向性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人们心灵深处对个体发展所持的观念。常听到人们评论说，在幼儿学步摔倒时，西方国家的父母多是让其自己爬起来，而中国父母则倾向于去扶；一位美国母亲可以任自己两岁儿子边吃边玩，把个冰淇淋抹得满头满脸而无动于衷，中国母亲在同样事情上要么亲自喂食，要么不停地用手帕帮孩子擦去那粘糊糊的液体。这些差异反映到课堂上，则会表现为不同的师生关系：中国教师对学生呵护有余放手不足；西方教师则相反，放任有余而要求不足。笔者调查发现，在近十几年中国高校教学改革中，最令人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按改革目标需要压缩某些教材内容时，很多教师宁可利用休息时间义务为学生补上那些被删掉的内容，理由是“不放心”让学生自学。这种情况在美国高校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差异，显然与文化传统形成的心理倾向性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在当前和今后高校教学改革中，若要在人才培养上实现独立思考、决策能力、批判精神、自学能力以至创造力这样一些重要目标，以及使学生具备象人文素质这样的基本素质，应更多地关注文化传统的影响。由于改革

教学与课程实际上是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如果较充分地考虑到文化传统因素的作用，会使我们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 传统文化与 中国高等教育

刘海峰（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生导师）

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是一种潜在的、深层次的联系。比起经济和政治因素来，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影响较为迟缓且不明显，然而却是较为久远和深刻的。中国高等教育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产物，也无法仅用政治体制的制约来解释，还应探寻较为深隐的传统文化因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曾经取得灿烂的辉煌的成就。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伦理政治型文化”，具有趋善求治、注重人文的特性。与传统文化的政治性特质相关，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如官办高校教师为学官，学生则具有“准官员”的身份和地位；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并与科举考试制度紧密结合；在一些朝代实行中央部门办学的高教管理体制；重视与“治术”有关的经史子集而轻视科学技术教育等等。由于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它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会与新质文化相结合并不断绵延，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些特点对近现代的高等教育还有相当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在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方文化和高等教育制度对中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渗透和移植。中国人先是不情愿地被动地打开国门，尔后又急不可待地模仿、学习西文、西艺、西政以及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在进行大规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横向文化传递的同时，担负着纵向文化传递任务的教育，还是将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要素和特色传承、积淀下来。近代中国纵横交织的文化传递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经纬图，其间中西高等教育模式也经历了一系列冲突、汇聚